

何谓“三皇”：文化演进三阶段的人格化代码

陈仲庚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三皇”所代表的时代，是从“一万年文化史”到“五千多年文明史”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时间距离在五千年上下，因而“三皇”不可能是三个具体的“个人”，而只能是三个不同文化阶段的具有人格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代码”。结合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材料分析，“三皇”对应的“三个阶段”是：燧人祝融氏代表了人类用火烹煮的初始阶段；太昊伏羲氏代表了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炎帝神农氏代表了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正是经过了这三个“初始阶段”的文化演进，中华大地才开始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关键词：三皇；文化演进三阶段；人格化文化代码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 (2024) 01-0015-07

追溯人类历史的进步，中华大地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从“一万年的文化史”到公元前 2070 年夏王朝的建立，在这六千多年的时间里，一般认为所对应的就是“三皇五帝”时代。从考古学的实证来看，在距今 5500—5000 年间的崧泽文化后期和良渚文化早期，中国同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一样，同步进入国家文明社会，与此相对应的也就是“五帝”时代；再往前追溯五千年上下的“文化史”，就应该是“三皇”时代。很显然，“三皇”所对应的“文化史”是如此漫长，因而不可能是具体的“个人”，而只能是一个“文化代码”，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三个具有人格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代码”，分别“代表”中华大地文化演进的三个阶段，亦即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家畜养殖的初始阶段和用火烹煮的初始阶段。

一、“三皇”起源的多元性：三皇名录诸说

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各地氏族部落在不同

的自然条件下，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原始文化。据古代典籍《山海经》《周易》《礼记》《国语》《春秋左传》《世本》《史记》《帝王世纪》《通鉴外纪》《通志》《竹书纪年》等记载，早在距今四千年前，中华大地就出现了燧人、祝融、伏羲、女娲、炎帝、太昊、少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禹等历史伟人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圣德之君，人们称他们为人文初祖或三皇五帝。

在中国古史系统中，一开始并不是如秦汉之后所认同的三皇五帝的历时性传承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较为认同的是“二帝、三王和五霸”古史系统。“二帝”是指其事迹为中国最早的经籍和史书——《尚书》记载甚为详细的帝尧和帝舜。“三王”是建立夏王朝的大禹、建立商王朝的商汤和吊民伐罪灭商建周的周武王。“五霸”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五霸”。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奇斗艳，各放异彩。儒、道、墨、法、阴阳、农、历、兵等学派，为了宣扬自己的理论学说或政治主张，往往开口闭口称“五帝三王”。至此，在当时各个学派的改造之下，中国古史系统又一变而为“五帝、三王、五霸”。而此时，“三皇”的称呼尚未成型。直到战国末年，秦国统一中国之势已成定局，伴随

收稿日期：2023-08-26

作者简介：陈仲庚（1957—），男，湖南祁阳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文艺学。

秦国政治上统一大业的高歌猛进,思想上的统一意愿也开始露出端倪。当此之际,《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终结者问世,开始出现“三皇”的提法。于是,人们由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三王”上溯到“五帝”,再上溯到“三皇”。

由于“三皇”之说的提出,不像“三王”之说那样是建立在真实且在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历史事实之上,而是根据各自的学说主张或政治思想需要,从上古无数氏族部落的首领中选取的,于是“三皇”名录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 庖牺、神农、黄帝三皇说。

孔颖达以《世经》所列的庖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庖牺氏即伏羲氏,或称太昊、太皞,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由他和女娲氏兄妹相婚而产生,又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易经·系辞》说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作八卦以开创中华最初文明。神农即炎帝,神农尝百草而兴五谷,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创始者,也是中国医学的发明者,与黄帝合而称为“炎黄”,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

(二) 伏羲、女娲、神农三皇说。

女娲氏又称娲皇氏,传说她曾经炼石补天,抁土造人,是人类的始祖;以伏羲、女娲、神农三位传说中的上古圣贤为三皇者,首见于《风俗通·皇霸篇》:“《春秋运斗枢》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渭水注》中亦云:“庖牺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

(三) 祝融、伏羲、神农三皇说。

祝融最为著名的故事,是与共工氏争位并击败共工,使共工怒触不周山。以祝融与伏羲、神农并为三皇者,以《礼记·谥号》为首倡。《风俗通·皇霸篇》载:“《礼记·谥号》中以伏羲、祝融、神农为三皇。”《庄子·祛箴篇》将次序调整了一下,以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史记》又调换了一下次序,以伏羲氏、神农氏、祝融氏为三皇。《白虎通》云:“三皇者何谓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

(四) 伏羲、神农、燧人三皇说。

以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这一说法由《尚书大传》所提出,并由梁武帝萧衍所认定。燧人氏是传说中钻木取火的发明者。

(五) 黄帝、少昊、颛顼三皇说。

少昊,又作少皞,名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曾以鸟名为官名,设有工正和农正,管理手工业和农业。颛顼,号高阳氏,传说中古代部落首领,曾命重任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命黎任火正之官,掌管民事。王莽封定黄帝、少昊、颛顼为三皇。

此外,还有伏羲、神农、共工三皇说。另外还有超出中国古史传说体系范围的三皇说,如天皇、地皇、人皇之三皇说,或如道家经籍中所载的初三皇、中三皇、后三皇之类。

西汉末年的《世经》,根据五行学派的理论,按照五德相始终的次序,再度排出一个上古时期帝王系统表。《世经》所排出的三代之前古帝王传承系统,其次第如下:太昊庖牺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摯)——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这一古帝王传承系统,是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排列的,共有9人,其中共工、帝摯由于其生平恶德,不在五德之中,故亦不占相生之序。《古文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这就等于把《世经》所列的八位五德帝王分为不同等级的两个部分。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对《书序》进行解释时提出:黄帝以上三人为“皇”,少昊以下则为“帝”。于是,《世经》所按五德相始终编排的古帝系统,在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心目中,前面的三位就升格为“三皇”,其接下来按五德循环即位的五人乃为“五帝”。在汉初所流行的五帝系统中,黄帝本为五帝之首。但是,为了解决《世经》排序中多出一个少昊金天氏的问题,人们就把五帝之首的黄帝上升为“三皇”之一。

毫无疑问,“三皇”名录的多样性,源自中华文明诞生之初原始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考古学

界的泰斗苏秉琦，曾根据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提出了“满天星斗说”，并认为这些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而划分这些区域的主要依据就是陶器。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1 万多年的灰陶，有 8000 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 7000 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 6000 多年的大汶口文化的“蛋壳黑陶”等。陶器不仅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特色，还可以代表一种文化的特色。

毋庸置疑，陶器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代表了人类的创造发明，尤为重要是决定了人类“吃什么，怎么吃”的生死攸关大问题。可以这样说，没有陶器的发明，伏羲氏不可能养“豕”为“家”，亦即人类不可能过上“安居”的生活；神农氏也不可能“广种百谷”，带来农耕文明的发展。因此，在“三皇”名录的厘定中，陶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炎帝神农氏：代表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

早期人类以采集野果和打鱼狩猎为生，而从采集渔猎走向农耕时代，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革命。然而，第一次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还必须借助于一个中介环节：烹煮。也就是说，不经过“烹煮”，人类吃着“生谷生米”，获取不了维系生命所需的营养，稻、粟、黍、菽、麦等五谷就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主食，因而农耕时代也不可能到来。而要烹煮，就必须有烹煮器，这就是陶器的发明。那么，对中华文明来说，农耕与陶器同时出现于何时何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时间是一万年前，地点在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稻标本，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纪录。玉蟾岩遗址在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以及人类制陶工业起源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而突出的地位，被誉为“天下谷源、人间陶本”。1995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 年，被评为“20 世纪 100 项重大考古发现”。200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 1993 年、1995 年、2004 年等三次考古发掘的玉蟾岩遗址，具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特征。三次考古发掘均出土了陶片，但分属不同的个体。1993 年，考古队员在漂洗玉蟾岩遗址近底部的文化层土壤中发现二枚稻壳，颜色呈黑色。出土的陶片大致可复原成釜形器，形态类同，个体略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这次出土的陶片进行质谱加速器碳十四年代测定，确定了四个数据。其中用陶片上的腐殖酸测定年代为距今 12320 ± 120 年；用陶片基质测定年代为距今 14810 ± 230 年；用同位层的木炭测定年代为距今 14490 ± 230 年。这是当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烧制陶片。1995 年出土的陶片可复原成一件釜形器，陶釜为侈口，圆唇，斜腹壁，尖圆底。同年，在层位稍上的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二枚稻壳，颜色呈灰黄色。

2004 年还发现了更原始的陶片。为了更精确地测定这些陶器碎片的年代，而且不破坏玉蟾岩的大自然生态环境和小自然生态环境，考古工作人员对陶器碎片出土的周边地层进行了详细的碳年代测定分析。研究人员从周边地层中提取了 100 多个骨碎片和木炭沉积物标本，对其中 29 个样本进行放射性碳测年，从而获取了有关周边不同地层的年代脉络。将陶片与发掘出土地层相对比之后，研究人员初步确定陶器碎片的年代距今 1.8 万年。

值得注意的是，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粳、籼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经测定，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约 1.4 万—1.8

万年，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水稻栽培与制陶几乎同步，而且最早的陶器就是陶釜或者说“陶锅”，这也足可证明“烹煮”对农耕文明的重要性。

“烹煮”不仅要借助器具，更要借助“火”的力量。用火，在远古人类的进化史上，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将“用火”与“烹煮”相结合来厘定“三皇”名录，恐怕更具有科学性，也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最早的“三皇”，或许是共时性的，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人物或是不同区域文化的代表人物；但从历时性的角度去厘定“三皇”名录，或许更具有合理性。因为从文明进化的角度看，“三皇”更重要的不是指具体的人物，而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人格化文化代码”，代表了人类文化进步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该如何确定？“民以食为天”，对早期人类来说，“食”不仅压倒一切，甚至是生存的“唯一”。因此，以“食”为依据来确定这三个阶段，应该就是：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用火烹煮的初始阶段。这三个阶段，农耕种植与驯养家畜不一定有明确的前后相继关系，但用火烹煮则一定是在最前阶段。

目前，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考定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较为复杂，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一万多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但当时的种植规模显然不大；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碳化人工栽培稻，将稻作农业推到了黄河流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7000年前已经有了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但渔猎和采集仍是河姆渡人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稻田，而且该遗址以制陶业为主，已是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的结合，渔猎和采集已经不再重要；浙江余杭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此时的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仅以稻作农业而言，经过数千年的种植历史，才逐渐来到“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时代，完全进入农耕文明的传统社会。

水稻种植的历史很复杂，如果再加上北方粟、黍、菽、麦等作物的种植，其演化演进的历史就更为复杂。然而，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不管其种植的历史、范围和农作物品种是如何复杂，要在“三皇”之中找到一个相应的人格化文化代码，似乎又很简单，那就是非“炎帝神农氏”莫属；而且，不管是北方的旱作农业区还是南方的水稻农业区，都认定“神农教稼穡”是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诸多的文献典籍的记载，似乎已成定论：《世本·帝系篇》首把炎帝和神农氏连在一起称“炎帝神农氏”，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汉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提到赤帝时又把赤帝与神农氏合起来，说赤帝即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左传》《国语》和《礼记》曾提到烈山氏能够播植百谷百蔬。东汉郑玄注《礼记》和三国韦昭注《国语》，都说烈山氏为炎帝。《水经注》卷三十二又把烈山氏和神农氏相并，说谬水西南经过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就是烈山，山下有一个洞穴，相传是神农氏的诞生处。《礼记》称神农氏为烈山氏。不管中华大地上人类种植的历史有多长，“炎帝神农氏”的称谓有多复杂，但“神农教稼穡，播植百谷蔬”——距离以农耕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明社会的开启总是最近的。因此，将“炎帝神农氏”作为“三皇”最后阶段的具有人格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代码”，应该是顺理成章、无可争议的。

三、太昊伏羲氏：代表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

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从考古发现中可以找到明确的断代，这就是始于大汶口文化初期，盛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葬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猪已经成为财富的象征。所以，富有的大墓，才用数量较多的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颚骨和猪头随葬，甚至有用整猪随葬的。考虑到将野猪驯化为家猪必定有一

个过程,所以将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推定为大汶口文化初期,这应该是科学、合理的。

第二阶段作为人格化象征的文化代码,自然而然就应该是“太昊伏羲氏”。《易·系辞下》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古代的典籍文献,一般都认为伏羲氏是在神农氏之前。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人类的养殖可能晚于种植,但养殖业的成熟却可能早于种植业。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便发现大量猪头或猪下颚骨陪葬,说明此时的养殖业已基本成熟,养猪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汉字造字以“豕”为“家”,亦可证明养猪的重要性和普遍性。那么,以太昊伏羲氏对应人类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是否顺理成章?从历代典籍的记载看,伏羲的贡献主要在三大方面:一是创立八卦,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尤其是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圆融性思维方式和“则天顺应”方法论,是中华文明和合文化的原点;二是教民作网罟用于渔猎,并教民将小野兽驯养起来,开启了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三是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从这里可看出“婚姻家庭”与动物养殖的关系,同时也可见出古人造字以“豕”为“家”的由来及其合理性。尽管伏羲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颇多,但“民以食为天”,种植和养殖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两大命根,因而伏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开启了“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

当然,从文化史的角度说,伏羲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先天八卦图”。从人类思维方式的意义说,“伏羲八卦图”的实质,是原始先民在质朴、简易的原始思维状态下不断探索,在凡人俗事背后找到一个思维的制高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深层次的考察,从而感悟到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最基本规律,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阴”和“阳”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并用八卦这种特殊语言表达出来,从而打开人们认识世界的闸门。这当然不可能是一人之功,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是原始先民不断探索、不断

积累、不断总结提炼的结果。后来的周文王以八卦为基础,将其两两相叠推演成六十四卦,构筑了博大精深的“周易”哲学体系,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上升到方法论层面,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国人不管对待任何事情,都以追求“和”为目标。例如在饮食文化中强调“五味调和”,在建筑文化中强调风水和顺,在婚姻文化中强调阴阳谐和,在家庭关系中强调“家和万事兴”,在国家治理中强调“九族和睦”,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协和万邦”,在自然关系中强调“天人合一”“神人以和”,……可以说,“和合”基因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理机制,不可须臾或缺。而这一切,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阴阳八卦”的影响,是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再充分利用自然的结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伏羲与太昊本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伏羲属于仰韶文化圈,太昊属于大汶口文化圈,发展到后来,太昊伏羲氏连为一体了。

考古学意义上的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大汶口文化,则是分布于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两种类型的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虽然晚了500余年,但延续时间均有2000年,这在人类文明的考古史上,并不多见。

仰韶文化的时代,就是文献学上的伏羲时代,有学者认为,伏羲与“父系”谐音,伏羲所代表的就是“父系”时代。台湾史学家彭建方在《中华民族纪元年表》一书中,将伏羲十六代详细列了出来,时间延续1300余年^[1];此前有燧人氏,其后有神农氏。也就是说,仰韶文化2000年所对应的,应该就是文献学上的“三皇”时代。这样的对应虽然不一定很准确,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古代文献所记的上古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大汶口文化的2000年时间该如何对应?张福祥的《东夷文化通考》一书,对太昊(包

括少昊)进行了详细的考释、论证,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太昊、少昊是东夷人,而且是东夷族的领袖;第二,太昊对中国上古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考古学家栾丰实的《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则明确指出,太昊出生于大汶口文化中期^[2];也正是在太昊时代,大汶口文化向西、向南迅猛发展。也就是说,太昊本是东夷族的领袖亦即大汶口文化的代表,但后来太昊与伏羲结为一体了,在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3]一书中,太昊被列为伏羲第四代,少昊被列为伏羲第六代。他认为伏羲传至太昊,在泰山地区得到巨大发展,因此称太昊、泰皇。还有很多学者将太昊伏羲氏看作同一人,如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等。在民间,也是太昊伏羲陵庙合一,如位于河南省淮阳县的太昊伏羲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占地875亩,规模宏大,始建于春秋时期,增制于唐代,被称为“天下第一陵”,历代帝王曾50多次来此祭奠。1997年6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参观太昊陵后,亲笔题写“羲皇故都”四个大字。从这里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从一开始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太昊与伏羲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代表、不同族团的领袖,但发展到后来,两种文化“混合”为一个整体,太昊与伏羲也“和合”为一体。这正如何光岳所说的:“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西羌族团和东夷族团乃是同宗共祖的双胞族,所以分成双胞族,正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为了适应繁衍人类的婚姻关系的需要”^[4]。这当然不仅仅是婚姻关系的需要,更是民族心理认同的需要。一开始,或许是在同一个庙里祭祀太昊和伏羲两位祖先,久而久之,则完全认同为同一祖先,“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也完全和合为同一族团——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也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太昊伏羲时代亦即从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和合”为一体开始,就已经奠基了。

四、燧人祝融氏:代表用火烹煮的初始阶段 最为复杂的,可能是“用火烹煮的初始阶段”

该对应“三皇”的哪个名号的问题。《尚书大传》等古籍将燧人氏列为三皇之首,奉为“天皇”,尊称“燧皇”。燧人氏钻木取火,成为中国古代人工取火的发明者;教人熟食,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使人类与禽兽的生活习性区别开来,被后世奉为“火祖”;而且,根据神话传说的记载,燧人氏生伏羲氏、女娲氏,似乎顺理成章在伏羲氏之前就应该是燧人氏。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年编制的《中国历史年表》,将燧人氏所处的年代界定为100万年,这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相距过于遥远,既无法与人类驯养家畜和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有机衔接,更无法与“五帝”时代相连接。

其实,燧人氏教人“熟食”,解决的只是“茹毛饮血”亦即“肉食”的问题。很显然,“肉”类的“熟食”较简单,只要放在火上“炙烤”就行了。但是,中华大地是以农耕种植为主导的,五谷杂粮等“素食”才是“主食”;五谷杂粮该如何“熟食”的问题,燧人氏并未解决。于是,这就需要引进另一个名号:祝融氏。

在《礼记》《庄子》《史记》等典籍中,祝融氏本就是“三皇”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祝融氏发明了“烹煮”,解决了五谷杂粮的“熟食”问题。这里,首先要明确“祝融”的词义。据虞翻《史记集解》的解释:“祝,大;融,明也。”“祝”何以为“大”?《说文解字》云:“祝,祭主赞词者。”《唐韵》则云:“赞主人飨神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在祭神的时候担任主祭、诵读祭文的人就是“祝”。祭主飨神为祝,“神”为大,“祝”也为大。“融”何以为“明”呢?这就与火相关了。《说文解字》云:“融,炊气上出也。从鬲,虫省声。”可以说,“融”的本义就是“炊气上出”。因为“融”的左边是“鬲”,本就是炊具;右边的“虫”,原为云朵状,是“炊气上出”的描形,后来衍化为“长蛇”之类的“虫”,并非其原始本义。因此,以“鬲”等炊具“烹煮”食物,是祝融氏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人类饮食文化的一大飞跃,其历史意义不仅是解决了五谷杂粮的“熟食”问题,更是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快速发展,并带来了定居生活的稳定。农耕种植

是春播、夏管、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都离不开人的劳作，才能确保一年的收成颗粒归仓，并确保日常的温饱生活能够持续下去；同时，有了温饱生活的保障，家家有“豕”才能成为现实。由此而论，正是祝融氏的“用火烹煮”，为伏羲氏的“驯养家畜”和神农氏的“农耕种植”打下了基础。

经过以上的梳理分析，可以将“三皇”名录及前后次序厘定为：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历史性人格化象征的文化代码，这应该是相对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当然，考虑到后两个阶段的文化代码“炎帝神农氏”“太昊伏羲氏”都是“合体”而非“单体”，那么在“用火烹煮”的第一阶段，也应该将燧人氏的贡献也纳入进来。这样，“三皇”名录就可表述为：燧人祝融氏、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前文提到，“三皇”名录从共时性转向历时性，本就结合了诸多部落的创造发明和贡献，不可能是一人一时的功绩。因此，笔者认为，“三皇”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甚至也不可能是“同两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一个时代集体智慧的“结合体”，或者说，是将相应时代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到了“三皇”这个具有人格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代码”身上，他们只能是“集合体”，而不可能是“单个体”。诚如是，在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两个“合体”之前再加上“燧人祝融

氏”，才更能体现“三皇”所特有的“文化代码”本质。

总之，三皇名录的厘定，需要考虑双重因素：一是文明初期的贡献，二是对后世的影响力。炎帝神农氏除了“农耕种植”的贡献外，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心理认同，其对后世的影响力是无可比拟的；太昊伏羲氏除了“驯养家畜”的贡献外，其“卦易文化”的影响，至今犹是历久弥新；燧人祝融氏除了“用火烹煮”的贡献外，其“火神精神”和“饮食文化”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因此，以“双重因素”为依据所厘定的“三皇”名录燧人祝融氏、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应该是最为妥当的三个“具有人格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代码”，代表了用火烹煮的初始阶段、驯养家畜的初始阶段、农耕种植的初始阶段等文化演进的三个历史时期；舍此，再难找到“两全其美”的名录。

参考文献：

- [1]张福祥.东夷文化通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 [3]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 [4]何光岳.东夷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94.

(责任编辑：潘雁飞)